

DONGHU·RENWEN

平湖乍浦籍学者陈左高——

中国日记史研究第一人

■ 乍浦历史文化研究会

一九八二年，平湖乍浦籍的我国当代金石大师陈巨来先生的《安持精舍印从》付梓在即，时间紧迫，由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施蛰存先生撰写的“序言”已送达，唯缺“后记”尚无着落。巨来先生发话道：“‘后记’非左高莫属。”巨来先生所说的左高，便是他的胞弟陈左高。于是，《安持精舍印从》的责编陈贞馥女史立即与陈左高联系，相告其兄巨来先生让其提笔作“后记”之意。据说，约莫四十分钟，出自陈左高之手的一篇精到、简约的“后记”就一挥而就，令陈贞馥欣喜不已，连说“这堪称倚马千言也”。施蛰存阅过“后记”后，亦大为赞赏。

陈巨来（1904.4—1984.2）与陈左高（1924—2011）是同胞兄弟，是乍浦东陈十二世陈鸿周的儿子和幼子。陈鸿周（1867—1948），字渭渔，后改演周。清同知衔，福建候补知县，又以直隶州知州加知府衔，曾委署惠安、漳浦等县，辞未到任。辛亥革命后，陈鸿周迁居沪上。陈鸿周生七子一女：长子埶（巨来）；长女襄；次子隼，早夭；三子夷同（字咏荅）；四子统照；五子学敬、六子蛟，皆夭折；七子延，又名上咸（字左高）。陈巨来为长子，陈左高排名老七为幼子，尽管兄弟俩一大一小年龄相差20岁，学业殊异，却理念常通，互相嘉勉。陈左高与长兄陈巨来的朋友张大千、刘海粟、吴湖帆、龙榆生、郑逸梅亦相谈甚融，尤其与文史家郑逸梅交往密切，后来郑逸梅与陈左高的交谊甚至超过了巨来。而陈左高的一些朋友，如周谷城、伍蠡甫、陈子展等，亦与陈巨来先生交往日多。乍浦东陈十三世裔陈巨来、陈左高，昆仲两人，一文一艺，巨来悉心治印，成“元朱文为近代第一”。陈左高则致力于古代日记研究，成为“撰写出版中国日记发展史第一人”。一长一幼、一文一艺的成就由此可见杰出与非凡。然而，时人对乍浦东陈十三世裔有“元朱文为近代第一”的陈巨来大师印象比较深刻，而对同是乍浦东陈十三世裔“中国日记史研究第一人”的陈左高先生了解甚微。这也如陈左高的日记写作及学术研究偏属“冷门”一样，陈左高先生也是乍浦东陈的“冷门”人物。

陈左高是怎么成为“中国日记史研究第一人”的呢？这要从他小时候的求学说起。

陈左高出身在上海，生前曾与友人谈及对日记写作及学术研究的兴趣时曾说过：“从十岁起，即萌发写日记的兴趣，后来遇到国学大师唐文治教授诵读古文，唐先生教泽，获益匪浅，及至后来，从诵读古文到研读古代名人日记，一步步对日记写作与学术研究有了兴趣。”

陈左高与唐文治的相遇是在一九三九年。当时创办于民国9年，地处惠山之麓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简称国专）迁至上海不久，陈左高便以优异成绩考入该校。国专学校设二年预科三年专科，分文学、哲学、史地三科。当时唐文治（字蔚芝）任校长，他敦聘王遽常任教务长。

唐文治为国学大师。他以创建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的务实精神，用之于国专。国专学校以精研国学为主课，授课教师均为卓然成家的一流学者，早期有陈石遗、钱基博、李详等名师。四十年代又聘周谷城讲中国通史，王遽常讲诸子概论，蔡尚思讲中国思想史，钱仲联讲诗学研究，朱东润讲历代文选。陈左高浸润于治学如此严谨的国专校园，学业精进。当年唐先生对于古文读法甚为讲究，将之分太阴、太阳、少阴、少阳四种，抑扬顿挫，轻重缓急，文章的立意，往往随着音调跌宕迂回，波澜起伏，尽从诵读中表达出来。唐先生如此读书法，陈左高常得亲沐，且体味再三。有一次，唐先生命陈左高诵读欧阳修的《伶官传序》文，他听后觉得学生未能完全表达出一唱三叹的韵味，即一手指点迷津，并当即示范，使陈左高茅塞顿开。及至下一次，仍由唐先生授大课，便选定贾谊《过秦论》作诵读范例。此文虽气势磅礴但颇不易读，唐先生仍命陈左高试读。这一次，陈左高胸有成竹，诵读时气足神定，又铿锵老练，语音与节奏鲜明高亢，酣畅淋漓。读毕，唐先生大加赞誉，将陈左高许为诵读古文的唯一继承者。后来，左高相继诵读《诗经》《离骚》《昭明文选》《经史百家杂抄》，凡五六百篇。那时精读之文必须背诵，务使熟极而流畅，惟其如此，才能终生受用不尽。忆及国专的五年学涯，陈左高感恩亲炙唐先生教泽，获益匪浅。唐文治治学“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高足辈出，如马茂元之于唐诗研究，冯其庸之于红学评述，汤志钧之于史学探求，均著称于世。而陈左高能得唐先生如此褒奖，实为难得矣。而郑逸梅先生则称陈左高为“唐门弟子的佼佼者”。

一九四五年，陈左高完成国专专业考入复旦大学，开始与学林前辈及师友交往求益，他耳闻目睹，每获心得，便悉数记入个人日记之中。自此，他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日记，每日所记均可作独立华章，精彩叠出，内容多珍贵史料。一直到“文革”止，共积累日记三十二册，用荣宝斋瓷青纸作封面，以丝线精装，可见他对日记写作情有独钟。可惜这些日记在“文革”中皆被付之一炬。

陈左高从自己写日记到搜集历代日记再到研究日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阶段，而且搜集历代日记再到研究日记几乎是前人没做过的事业，陈左高偏偏选择了这个“冷门”。

陈左高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即留校任助教，初专治唐宋古文、晚清散文，二十岁出头，就在《申报》《益世报》《永安月刊》等发表评述唐宋散文的文章。在教学中他辅导学生翻阅《丛书集成》，从中浏览到陆游、范成大、方凤等多种名家日记，深感许多日记不仅行文简练优美，且颇多第一手史料。一次，陈左高在研读到宋代诗人周必大曾有诗云“陈迹时将日记开”，指日记可供自鉴自厉。我国古代日记，源远流长，卷帙浩繁。古人记下的日记，是每日生活的实录，也是当时社会史实的见证，不失为我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由此，陈左高开始搜集整理历代日记并潜心进行研究，成为当时学人研究日记文献的第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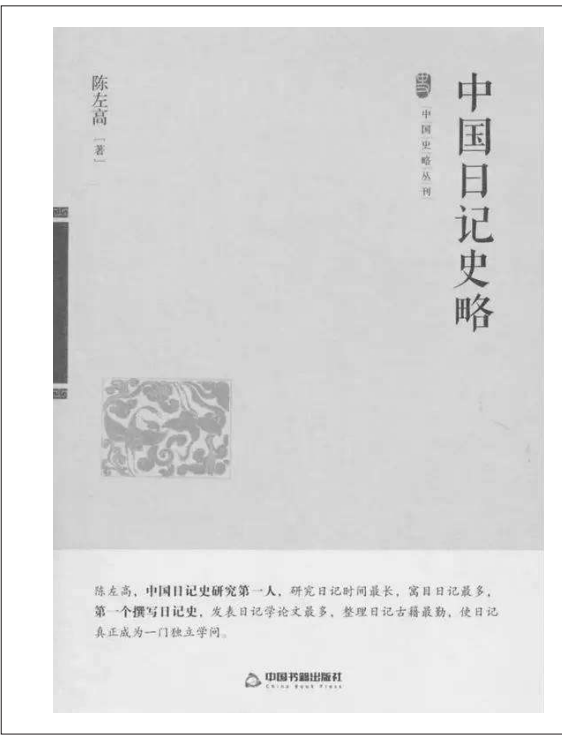
陈左高先生对历代日记佚篇的补辑与考证，尤下苦功。他以严肃求实的学术精神，考研着古代每一部日记的作者及流变。一次，陈左高先生找到了清代著名文学家、著作等身的李慈铭还留有《越缦堂日记》及《日记补》，计数百万字。这些日记，对了解当时的社会经济、历史宗教、文学艺术诸方面都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他当即开始研究，但在爬梳考证中，陈左高发现《越缦堂日记》尚残缺不全。传说李慈铭光绪十五年以后的日记，被樊增祥收藏，后樊增祥去世，日记流入书摊，不知下落。对这些说法，陈左高以为大可存疑，不能轻易下结论。他埋首在故纸堆中，又辑得三种，终获其全，解决了百年来的一个悬案。又如海内外认为文廷式日记缺少两种，陈左高又孜孜以求，补辑佚失，纠正了误传。再如，梁启超日记，行世者仅访美日记《新大陆游记》，陈左高又补以驻日所记《双涛阁日记》丰富之。还有明代高攀龙、潘允端，清代查慎行、沈宝禾、王乃誉等日记，皆是陈左高辑佚所得的重要日记稿抄本。

更重要的是，关于日记的起源，陈左高综合历代论者的考查成果，概括为三种说法：一是起源于西汉说，二是起源于东汉说，三是肇始于唐代说。在没有翔实资料的确证下，姑且将三种说法同时并列。几年后，陈左高看到当时一篇文章中谈到，二十多年前，江苏扬州掘到一座西汉宣帝时平民王世奉墓葬，箱内存十余件木牍，多有年月日的简单日记。作者因“有事”，在狱中随手记下亲友来探监的经过。这一木牍的发现，给陈左高提供了最早一位有姓名的日记作者。日记起源由此推前至二千年前的西汉，即公元前无疑。对这一收获，陈左高欣喜难抑，当即著文阐述，亦在《中国日记史略》修订时一并补充，使日记的起源始得匡正，亦更为确切。

具有悠久历史的日记文本，虽为数浩繁，然由于素无专目，真正刊印成刻本的寥寥无几，有的载见于各种旧报及刊物上，更多的则散落于民间私人藏家。若要阅览访求，实非易事。从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起，陈左高为访求日记文本，奔走于复旦大学图书馆、合众图书馆、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等，不分寒暑风雨，没有节假日，孜孜矻矻于历代日记的发掘、整理、研究，遍览各种刊本日记及手稿、抄本日记，还从大量新旧杂志、文集、年谱中，一点点辑录、挖掘出大量散佚日记，经其寓目并研读的日记达一千二百多种。尤其是一些手稿、抄本，大都散佚，或属私家皮藏，难以涉猎，师长友朋得悉陈左高潜心研究日记，纷纷为其推介或伸出援手。

复旦大学的陈仲明教授主动将翁同龢、曾国藩等日记长编十多种借给他。陈教授的这些书籍解放前都存放于外滩中国银行大楼底层的保险室内，牢牢钉在一只只大木箱中。陈仲明教授后来得知陈左高研考需要，亲自带人启箱取出，再用车运送到陈左高家，令左高深受感动。

赵景深先生是一位热忱扶植青年学者的教授，他向陈左高提供了不少新发现的稿本日记。明史专家谢国桢买到袁励准的《秋篱剧话》，交到赵景深手中，但他感到这是一部重要的东北地区看戏日记，即写信让左高赶快去翻阅摘抄。藏书家潘景郑慨然将著视楼所藏二十



多种孤本借与左高，多属苏州名家手稿，潘爵治病日记即属其中之一种。

更使左高不能忘怀的是，版本目录专家顾廷龙先生对他的关怀。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顾廷龙任合众图书馆馆长，陈左高经常到馆内查找、阅读旧籍的好学身影引起了他的注意，询问之下，方知左高在钻研日记，便赞誉有加，高兴地对左高说：“合众馆时刻都欢迎你来查阅书刊。”由此使陈左高得以在该馆阅读到近二百种古代日记，其中不少是稀有的稿抄本。不仅顾老，就连当年在此看门的杜师傅也被陈左高的坚韧毅力所打动。有一天傍晚，刚下过瓢泼大雨，图书馆空无一人，然而陈左高却蹬着积水，准时来到馆内，杜师傅忙不迭地把左高迎进来，说：“你安心看书，我住在馆里，每天可以多陪你几个小时。”不少前辈知道陈左高迷上日记研究，纷纷给予无私相助，袁道冲老先生即是一位。他辗转听到陈左高的住处，亲自雇车把他祖传的袁昶《浙西村人日记》手稿七十二册送来，供左高研究使用。这部日记记载着同光年间学术界动态，作者与海外文化交流，以及治学心得，其学术价值不下于《越缦堂日记》。而上海图书馆仅有抄本五册，可见此稿的珍稀与价值。陈子展、周谷城、伍蠡甫等教授，对陈左高研究日记常给予鼓励支持，解疑释惑，使陈左高更坚定地在漫漫学路上跋涉挺进。

陈左高搜集和整理历代日记，对日记的研究也由此展开。他发现，日记作者大多按年月日、气候等形式如实记载，均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时代背景、经济动态、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友情往来、私人生活等不同侧面，内容包罗万象，蕴藏丰富，所取无尽。为此，陈左高便在当时的《申报·自由谈》上先后发表了关于日记研读的二十多篇专文。一次，陈左高赴新中国法商学院卢锡荣院长的宴请，他旁边坐的是时任交大教授、市教育局长顾毓琇。左高与顾毓琇教授交换名片后，顾老说，我是《申报》读者，对君写的文章均留有深刻印象。顾毓琇教授的一番话，让陈左高初尝学术研究的甜头，随后，陈左高更是乐此不疲，矢志不移地沉浸于日记研读的学海之中。时光漫漫，经几十年殚精竭虑，厚积薄发，他终于撰写并出版了《古代日记选注》，影响遍及海内外，港台均有再版，美国哈佛大学藏有其全部日记研究资料，日本亦藏有不少，韩国、菲律宾等国学者都给予高度评价。后来，陈左高的《晚清二十五家日记辑录》《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书信日记集》《中国日记史略》《历代日记丛谈》等陆续出版，开创了我国日记史研究之先河。陈左高先后在国内及《澳门日报》、香港《大公报》开设文史专栏。因日记撰者多为文学家、政治家、科学家、书画家等，又广涉政治、经济、科教、文艺诸领域，陈左高便由此汲取史料，择优所用，秉笔为文，仅在香港《大公报》“艺林”副刊，就刊文近五百篇。

陈左高在对日记中的人物、风俗掌故研究后写成的



历史人物与风俗掌故，笔法与众不同，均能从古代日记入手，引用翔实，令人信服。如在《龙华溯往》一文中，他以王韬写于咸丰九年（1859）五月十八日的日记为依据，考证出上海龙华在一百五十余年前，还是一处戍防要地，因为王韬日记中写道：“余唤僧启塔，直登其巅。目及十余里外，壁上蜿蜒皆西字，龙华为由松至沪扼要之所，设戍百人，就桥筑土垒，有大炮二。”如此写作，细节历历可见，为其他文献所无法比拟。再如，时人常谈论上海气候现象，感觉是夏天热甚，暖冬频现。但陈左高查得王萃元《星周记事》日记中却有这样的记述，那是咸丰十一年（1861）十二月二十九日所记：上海从虹桥到新桥，“雪拥及肩，道路不明，足无从入”，连续数十天，雪不融化。徐家汇附近，也是“漫天积雪，风涌如浪”，这时，太平军准备攻打沪郊东南，亦“为大雪所阻”。这些详尽的记载，为研究上海的气候历史，提供了最为原始可信的资料。

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故能畅抒胸臆。陈左高对所述史料熟若掌心，信手拈来，屡屡用于他的各种人物专题，从几百篇写历代文苑艺林人物的旧闻轶事中，可以窥得日记素材占到的重要篇幅。如写李叔同，从其《惠安弘法日记》中获知，自“泉州南门外，乘古帆船航海”，而抵惠安县东郊，南临泉州湾之崇武城讲经。从四月到十二月初三，居无定点，随遇而安，先后住普莲寺、黄善人宅、许连木童子宅及刘清辉、胡碧莲、黄成德等居士宅。在惠安，讲《华严经》《法华经》，几无暇日，到如是堂讲经，听者近百人，由于过度劳累，第二天就卧病惠安之草庵了。又写顾颉刚，从他《西北考察日记》中了解到，他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间，在甘肃、青海考察学校教育，笔下风土人情，民生吏治，以及个人感悟，事事都按日实录。

陈左高先生从二十多岁起，就孜孜于唐、宋、明、清散文和中国教育史，尤其致力于古代日记研究。几十年寒暑，终于敲开了这扇学术研究的“冷门”，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陈左高还先后在香港《大公报》《澳门日报》等开设文史专栏，广涉政治、经济、科教、文艺诸领域，怀人忆事，秉笔为文，仅在香港《大公报》“艺林”副刊，所刊近五百篇中，写的不乏有龙榆生、张元济、钱仲联、施蛰存等文坛宿老。据统计，他至今仍是发表日记学方面论文最多（200多篇）的一位学者；先后编著有《古代日记选注》《晚清二十五家日记辑录》《中国日记史略》《近代文学大系·书信日记集》《历代日记丛谈》等，成果斐然，卓有建树。2006年，“全国第三届日记论坛”组委会授予陈左高先生最高且唯一的荣誉——“日记写作与学术研究终生成就奖”，高度肯定了他在日记研究领域所作出的非凡贡献。

2011年7月26日，陈左高在上海去世，享年87岁。陈左高晚年还曾有意为长兄陈巨来写传，无奈突患中风，终因握笔维艰，夙愿无法实现，常耿耿于怀，留下终身遗憾。

（执笔：陈正其）

至今犹号凤凰基

——陆闾及其后人

■ 邓中肯

清代平湖新溪（今新埭）人陆增在《鸚鵡湖棹歌》中有一首竹枝词——

故居千古尚堪知，斯土相传东汉时。

甘露瑞征贤太守，至今犹号凤凰基。

诗中的“凤凰基”，原属海盐县华亭谷（现平湖市新埭镇南阳村），又名陆家栅，位于古运河旁，其东侧为鹤嗜泾，西侧为窑渚。据明天启《平湖县志》“古迹”条记载：“凤凰基，在县东北二十七里，汉太守陆闾隐居处，光武时为颍川守，致凤凰甘露之瑞，因以名基。”此诗中所说的“贤太守”指的就是陆闾。陆闾，字子春，海盐县华亭谷人，汉光武帝时曾任颍川太守，后拜为尚书令，赠中大夫。

陆闾年轻时英俊貌美，是出名的美男子。他喜穿越布单衣。平湖乃古越地，至秦代在吴越地建会稽郡。东汉光武帝见陆闾穿的越布舒适漂亮，常要会稽郡进献越布。

西汉末，陆闾为避王莽之乱而隐居渚上。其隐居宅地有凤凰栖息，家堂有甘露瑞降，所以取其地名为“凤凰基”。凤凰飞翔之地，即是兴旺发达之意。在以后的二千多年间，陆氏繁衍发展，遍布江南各地，成为江南一大姓。所以，凤凰基这个陆氏聚居之地，就成为江南最早的陆氏发祥地之一。这个地名自汉以来，一直沿用至今。陆机在《吴趋行》一诗曾云：“八族未足征，四姓实名家。”这里的“四姓”指汉晋时江南四大名姓王、谢、顾、陆。陆氏名列其中，为地域内世家望族，并为当时社会所公认。

陆氏谱牒都奉战国时齐宣王少子陆通为得姓之始祖。陆通生子陆发，为齐上大夫。陆发生子二：陆万、陆皋。陆皋生陆邕，陆邕生陆贲。陆贲为汉初名宦，生子陆烈。陆烈，字伯元，西汉时初任吴令，后晋升为豫章郡都尉，最终在任上去世。吴地人怀念他惠政于民，就迎葬于吴地的胥屏亭。陆烈的子孙从此就在吴地安家，成为吴郡人。陆烈就被奉为陆氏迁吴之始祖。

陆闾为陆氏第十七世。他生性聪明，笃行好学，具有美好的品德，长得又姿容俊美，所以光武帝见了他就赞叹说：“南方多佳人。”就想把宁平公主嫁给他。可是陆闾托病婉拒了。后来陆闾娶了金氏，生有三个儿子：陆叩、陆温、陆恒。他死后葬在苏州封门外，为江南颍川支的始祖。

陆闾的第三子陆桓担任过东汉本州从事，生有儿子陆续。陆续，字知初，曾任扬州别驾。陆续来到洛阳后被奸臣所害，被关在狱中。他老母知道后，匆匆从江南赶到洛阳，为儿子烧了他最爱吃的家乡菜——胡葱烧肉，想亲自送进狱中，但看监的狱吏坚决不让进。在陆母的再三要求下，只允许将陆母带来的那碗胡葱烧肉给带进去。陆续看到那碗香喷喷的胡葱烧肉就放声大哭。狱吏不知其故就问：“有好吃的了，为什么反倒大哭起来？”陆续说：“我一看到胡葱烧肉就知道是我母亲来了。因为这是只有我母亲做的家乡菜，肉成方，葱寸长，在洛阳是吃不到的。如今吃得到这道菜，却见不到母

亲，是多么的伤心！”

陆续生有三子：陆闳、陆逢、陆褒。陆褒，字叔明，官至尚书令，生有四子：陆礼、陆寂、陆纡、陆康。

陆康，字季宁，汉末历任武陵、桂阳、乐安、庐江太守。陆康的少子陆绩，字公纪，为三国时期著名学者。据《三国志》记载，陆康曾经担任庐江太守，并与袁术往来密切，陆绩六岁时随父到九江去拜见袁术。袁术招待他吃橘子。陆绩藏了两个橘子，临走时跪拜辞谢，袖子里的橘子却滚落地上。袁术笑着问他为什么不吃掉，陆绩回答说：“橘子很甜，我要留着给母亲吃。”后来袁术经常跟别人称赞他：“陆绩这么小就知道孝敬，长大后一定成才！”孝子陆绩怀橘遗母的故事，经元代郭居敬辑录编进《二十四孝》，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陆绩怀橘”这个生动而有趣的事亲事迹，称得上是孝亲顺长的典范、报答父母的样本。陆绩后出任郁林太守，为官清正廉洁。卸任后精研易学，著有《陆氏易解》《陆氏易传》等，但英年早逝。相传乍浦旧有陆绩故居，故名“怀橘里”。怀橘里有陆绩庵（又称陆绩圃），在西门内小街，故俗称西庵。至元代时因“怀橘遗亲”故事的名气太大，又改称“怀橘庵”。后怀橘庵毁于太平天国战乱，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重建。现存的怀橘庵，为一幢封闭式三合院，庵前东南侧还有一口水井，并栏圈形似八卦，泉水清澈甘冽，终年不涸。相传，这是当年用陆绩压舱的郁林石凿成并栏，所以这口井名“廉井”。